

一代华人困在硅谷(四)

赴美十年，终成炮灰？

统计，2008到2009年，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，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，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。

中国“留学热”开始于新千年，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。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，留学潮袭来，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。

2010年7月，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）》发布，进一步加速推进“支持留学、来去自由”。到了2018年，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，突破60万。

但2010年后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，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。数据显示，从2003年开始，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，2010年为2.11:1，2015年为1.28:1，而2002年时，这一数字还曾是6.94:1。

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，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。

当时“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”、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，在2016年归国，担任百度COO，被看

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；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，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；同年，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，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。

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，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，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。

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，不乏声音提到“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”“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”。但无论如何，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，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，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。

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，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。**短暂的繁荣后，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，没有退路。**

“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，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，但是其实很难，每个人都是尘埃。”Gemma说道。

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，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，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

问题。

最开始，选择哪家公司就职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，对在美华人而言，决定生存的“身份”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。

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：“从毕业后OPT，甚至挂靠，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，绿卡申请，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。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，重新选择，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，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。”

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，“**不管是工作签证，还是绿卡，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，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，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，所以放弃入职大厂。**”

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，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，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——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、面试受歧视、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。

再一次衰退来临，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？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，相比于宏观环境，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，

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，Gemma才意识到，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，远远超出她的想象。

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，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，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，但Gemma发现，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，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。一方面，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，不过度质疑候选人。

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，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，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，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：“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？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？才进去三个月，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？”

“很尴尬，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”，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，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。

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，“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”“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”……

“被裁之后鼓着

勇气去到市场上，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，是二次伤害。”Gemma很沮丧，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。”

在硅谷当个快乐“打工人”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，还是健身房会员、移动办公、餐补等，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，“节衣缩食”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。

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？“肯定有想过回国。”David欣慰的是，即使眼下陷入困顿，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。

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，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，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，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，“如果我在国内，是很难做到的”。

来自中国的“代码精英”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，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，但残忍的是，当大幕拉上，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均为化名）

来源：凤凰网